



广州社区党建与 社区自治

GUANGZHOU COMMUNITY
PAR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 AUTONOMY

王永平 / 主 编
孙瑞龙 黄凯旋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广州社区党建与 社区自治

GUANGZHOU COMMUNITY
PAR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 AUTONOMY

王永平 / 主 编
孙瑞龙 黄凯旋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王永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97 - 4303 - 4

I. ①广…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社区 - 党的建设 - 广州市 ②社区管理 - 研究 - 广州市 IV. ①D267. 7 ②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9747 号

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

主 编 / 王永平

副 主 编 / 孙瑞龙 黄凯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王晓英 邹绍荣 周 琼

责任校对 / 白桂和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03 - 4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19.5

字 数 / 34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陆学艺*

在我国城市的公共治理体系中，社区是属地治理的基本单元，对社区问题的研究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以王永平研究员为核心的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研究团队，长期关注城市治理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本《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就是其中之一。

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 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社区是在同一地域里，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人群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人们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社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区这个概念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的基层组织，承载着居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等学者把社区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开始，它只是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内部作为学术问题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城市建立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农村建立乡（镇）、行政村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元。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蓬勃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浪潮席卷全国，这大大加快了社会流动。城市中很多原来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的人流向社会，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需要得到社会应有的

* 陆学艺（1933～2013），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共服务。原来的街道、居民委员会架构已不能适应这种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天津、沈阳、武汉等城市的民政部门与社会学工作者合作，开发各种公共服务，引入社区这个概念，把在街道、居委会层级开展的这类公共服务，统称为“社区服务”。随着社区服务在全国广泛推进，社区这个概念由书斋走向社会，成为通用的名词，得到社会的认同。

1991 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设想，并专门召开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提出要在继续推进社区服务的基础上，改革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要把社区建成包括社区文化、社区医疗、社区教育等诸多社区工作的平台，使社区成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重要载体，实行新社区制。1998 年，国务院决定把民政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更名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从此，我国社区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区制在全国大中城市得到广泛推行。社区成为家喻户晓的概念，社区成为与广大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层社会单元。在城市社区取得了很好成绩背景下，国家把社区建设推向农村，在农村开展多种社区服务工作，把农村社区建设放到与城市社区建设同等的地位，使我国的社区建设进入城乡并举的新阶段。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0 多年来，国家主导、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行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城市，社区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成为区、街道下的基层组织，取代了原来的居民委员会（有的城市把街道改称为“社区委员会”，居委会仍保留原名），开展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在农村，有一部分村民委员会也已改称为社区委员会，大多数还是沿用原来的名称，但也建立社区服务站，开展相关的公共服务。现在社区建设、社区服务还在全国继续推进和完善中。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急剧变化的需要，由国家主导、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以在新形势下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基层组织为目的，以开展社区服务为重点，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建设环境优美、治安良好、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新型社区的一系列工作。这同当年滕尼斯讲的社区含义是不一样

的，就是同现在欧美诸多现代化国家实行的社区制也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社区，行政意义很重。我们的社区本来就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演变而来的，承担着很多行政职能，而欧美诸国的社区实行的是自治制。但是，既然都称为社区，相同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我们开展的社区服务，很多内容同他们是一致的。往后，这类的社区服务会越来越多，同他们的一致性也会越来越多。

社区自治方面，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可见，社区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自治是题中之意。当前，因为社区刚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转型过来，社区同街道、乡（镇）的各种关系还未理清，特别是由于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社区建设的财力、物力都还需要依靠政府拨付，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开支还需要政府补贴。所以，实现社区自治，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探索现阶段如何建设民主自治的新型社区中，作出了很多努力，积累了很多经验。一批多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模式正在涌现。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好社区党建问题，是一项新工作，也是一项新任务。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在社区建设各项工作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起领导保障作用。

社区建设，是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进行社区建设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构建了社区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建设一定要持续进行下去，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完善。适合国情、民情的中国特色社区自治体制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在把原居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委员会时，多数城市有两项组织措施：一是由城区街道向社区委员会派进脱产、半脱产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原来居民委员会是没有专职干部的；二是在社区委员会构建时建立社区党支部，并且明确规定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后来把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员关系也转到社区。在目前社区组织结构中，

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党组织，是社区组织体系的领导核心；二是社区自治组织。就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而言，社区自治、社区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要通过做好党建，做好各项社区服务，推进社区自治。而社区自治是将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今后如何做好社区党建，如何推进社区自治，如何把这两项工作结合好，是社区建设面临的难题，也是社区建设研究需要探索回应的重要理论问题。

《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一书，直面当前社区建设中的两大难题，足见作者们对社区建设实践前沿的洞悉，对理论探索的勇气与担当。本书尝试把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进行整合，在社区理论建设上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很值得重视和研读。

广州市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得风气之先，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三来一补”为特色的工业发展的珠江模式，使经济蓬勃发展，一路领先。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也走在前面。广州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开展得都比较早，这是因为广州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急剧变化，社会变得复杂多元，需要社区服务，需要社区建设。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成绩先出，经验先出，与此同时，矛盾也先出，问题、难题也先出，广州就是这样一个发达城市。所以，广州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前沿性。以王永平同志为组长的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运用党校学员多、分布广，与基层有广泛联系的独特优势，针对广州的社区建设开展了长期的调查研究，梳理了广州开展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工作的历程，分析了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炼了广州推进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的创新经验，也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本书不仅有益于广州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也为各地健全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建设和形成基层群众自治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理论研究扎根于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最近30年，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理论，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应用国外理论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照搬照抄是不行的。社区、社区自治等理论是引进来的。但中国的社区怎么建，社区自治怎么搞，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定要调查研究清楚实际状况，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一定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王永平同志主持研究的这项课题，注意了理论层面的研究与社区党建及社区自治案例研究的结合，从城市社区

建设的实际出发，采用了大量通过深入开展实地调研所得到的一手资料，得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结论。这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依然值得大力倡导。

永平同志领导的研究团体近年来在社区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其成绩十分值得庆贺。但是，国外开展社区工作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社区工作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社区建设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依然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探索。我衷心祝愿永平和他的研究团队能在这条研究道路上继续深入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2012 年 12 月 30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主报告

1. 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 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 / 3
2. 广州社区服务管理的新探索 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 / 74

第二部分 分报告

1. 越秀区传统型社区居民自治调查分析
..... 广州市委党校越秀分校课题组 / 105
2. 越秀区传统型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调查
..... 广州市委党校越秀分校课题组 / 118
3. 社区自治中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现状调查
..... 广州市委党校荔湾分校课题组 / 129
4. 传统型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实证分析
..... 广州市委党校荔湾分校课题组 / 139
5. 社区直接选举中的居民参与 广州市委党校海珠分校课题组 / 150
6. 单位型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途径探析
..... 广州市委党校海珠分校课题组 / 156

7. 天河区天园街社区“议行分设”情况调查	天河区天园街课题组 / 167
8. 商业住宅小区居民自治的新型载体	天河区五山街课题组 / 181
9. 转制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自治的调查与思考	广州市委党校黄埔分校课题组 / 198
10. 黄埔区转制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黄埔分校课题组 / 210
11. 传统社区与转型社区自治的运行机制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南沙分校课题组 / 219
12. 番禺区新型社区自治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番禺分校课题组 / 240
13. 白云区走马岗社区居民自治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白云分校课题组 / 250
14. 花都区基层社区党建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花都分校课题组 / 259
15. 萝岗区转制社区自治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萝岗分校课题组 / 268
16. 从化市北星社区自治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从化分校课题组 / 283
17. 增城市城镇社区自治情况调查	广州市委党校增城分校课题组 / 292
后 记	302

第一部分

主报告



广州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

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

当前,学界对于“社区党建”和“社区自治”的内涵理解有所不同。关于“社区党建”,本课题组赞成这样的理解:“实质上,社区党建是在街道党建、单位党建以及‘两新’组织党建的基础上,通过街道党工委的综合协调作用,将社区内的所有基层党组织较为紧密地连接、整合起来,以便形成、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推进社区建设的合力。”^①关于“社区自治”,本课题组赞成这样的理解:“所谓城市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②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学界对于“社区党建”和“社区自治”的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多年的社区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区党建是街道党建的拓展和延伸,对于引导社区自治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远意义。社区自治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形式,在推动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完善社区自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社区党建是社区自治发展的内在要求,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之

* 课题组成员和执笔人:王永平、霍秀媚、吴瑞坚、韦朝烈、崔凤国。

① 刘培轩:《社区党建现实状况和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当红网, <http://www.luckup.net/show.aspx?cid=618&id=63337>, 2008-7-26。

② 陈伟东:《社区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40~141页。

间的良性互动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动力。

本课题研究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州的社区党建和社区自治面临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广州进行了哪些实践和探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社区党建和社区自治？

本课题采用调查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课题组先后到广州市有关职能部门及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黄埔区、南沙区、番禺区、白云区、花都区、萝岗区、从化市、增城市的一些社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包括社区党建和社区自治的相关政策文件、书籍、论文和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撰写出本课题报告。

一 广州加强社区党建的探索与实践

广州是一座有 222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州城市社区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给社区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广州市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加强社区党建的重要性

1.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加强和完善社区党组织体系

（1）社区党建在社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区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是社会管理的末端，也是保持和谐稳定的基本单元。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必须把社区党建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这是因为：首先，街道党组织不适应社区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基层组织是依托单位和地区两个系统设置的，在“条强块弱”的情况下，党的组织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之中。随着城市生活中大量社会事务向街居空间转移，社区管理成为加强城市管理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街道党组织原有的地位、作用、职能和运作机制已不适应社区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其次，基层党组织的“条块分割”使单位党组织与街道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难以通过联动形成合力。在单位和地区分割的社区体系中，单位党组织和地区党组织也被隔离开来。由此，行政体系中的“条块冲突”制约了单位党组织参与并

推进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街道党组织难以与其进行沟通和协调。最后，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原来按行政建制设置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已经明显不适应新的形势，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又使党的建设出现了盲点和空白点。这种状况说明，我们党在社区建设中难以对体制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各种社会组织历来是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群众的重要阵地，如果党的工作跟不上新形势，适应不了新变化，就有丧失群众、丧失阵地的危险。

（2）大量商品房社区涌现。中国原有的住房制度，从投资体制、分配体制、经营体制和管理体制等综合来看，属于计划型，是实物分配福利性的住房制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国住房制度的弊端更加显现出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成为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住房商品化，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按市场经济规律组织住房的生产经营、分配和管理，提高住房资源配置效率。住房社会化，就是改变各单位自行建设、分配、维修、管理职工住房的体制，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的住房运行机制。1998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新体制。中国开始正式从“单位分房”时代迈入“个人购房”时代。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当代中国城市日益涌现出大量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拥有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已达到 45.2%。

广州是房地产开发较早的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不断涌现，因此，广州城镇居民拥有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商品房社区，相继出现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其他自发形成的娱乐性社团，居民（业主）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居委会更多的带有国家行政组织的属性，业委会属民间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属市场经济组织。由于三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也就难免经常会碰到“谁指挥谁”的问题；换言之，是“谁也指挥不了谁”的问题。此外，商品房社区中还存在大量的矛盾纠纷，有的社区甚至出现暴力和流血事件，和谐社区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商品房

社区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组织在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比其他商品房社区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3) 出现转制社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及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城市与农村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治格局,形成了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城乡差距也由此埋下伏笔。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标志,也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了城中村改制的探索,“撤镇设街”“撤村建居”逐步铺开,城中村演变成了向现代化城市区域迈进的转制社区。所谓转制社区,就是政府为推进城市化发展,对“城中村”及城市周边村镇进行改制,将原有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转变为城市管理的单一体制,实行有别于城市社区管理的一种过渡性社区。

广州(老八区)原来共有139个城中村,从1997年5月石牌街道办事处对石牌村进行撤村改制的制度变革试点开始,到2005年广州的城中村改制全部完成,所有的城中村转变为“转制社区”。转制社区兼具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某些特征,但又与二者有着实质的区别。我们调查发现,街道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普遍反映转制社区党建比较薄弱,缺乏一支精明强干的社区党建工作队伍,党组织在社区各类组织中的凝聚力还不够强,优势不明显,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较弱。由于经济联社掌握着财权,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需由经济联社拨付,有时因活动经费不足影响了党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目前的社区党建工作队伍主要是支部书记队伍,而支部书记年龄普遍偏大,文化水平不高,开展党组织生活的能力不强,需要培养一批年轻骨干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在当前社区选举制度的条件下,共青团员或在社区工作岗位锻炼的青年党员很难成长为社区党的干部。社区每年新增加的党员数量较多,但良莠不齐,多数质量不高。如每年要接收5~7名退伍军入党员,同时又要发展非公企业党员,加之大学生就业状况不佳和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许多从院校毕业的学生将组织关系转回社区党委,导致社区党员数量每年以超过10%的幅度增加。由于大多数党员不是在本社区发展的,他们对社区党组织的归属感不强,组织生活很难召集。此外,很多人的入党动机主要是看重两年一次的党员外出旅游或三年一届的社区选举。部分党员自身致富能力较

强，但带领群众致富意识薄弱，没有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些党员不讲党性，党员意识淡薄，不给补贴就不参加组织生活。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政治性与趣味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要么政治性太强，枯燥无味，对党员缺乏吸引力；要么过分强调趣味性，以旅游、娱乐代替组织生活，政治色彩不足。如果不重视解决存在的问题，势必削弱社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利于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4) “两新”组织不断产生。“两新”组织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两新”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广州的私营企业已经超过13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1.4万户，新经济组织创造的产值份额已经占广州市GDP的50%以上，工业产值中新经济组织的产值份额已经达到55%，超过了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仅2007年一季度，全市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476.62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31.7%，比2006年同期增长13.1%，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0.9%，拉动全市GDP增长4.1个百分点^①。新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广州经济快速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广州新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党员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根据广州市委组织部的统计数字，至2005年底，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职党员人数为23429名，占全市党员总数的5.36%^②。

在新社会组织方面，根据《广州统计年鉴2009》数据，截至2008年底，广州市登记的社会组织有9353个，其中民间组织3616个（含社会团体1313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303个）（见表1）；中介组织5737个（含会计师事务所165个、律师事务所299个）。广州市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有70万人，从业人员来源多样化，有国有、集体职工，有下岗职工，有院校毕业的学生，有退休人员，有社会自由职业者，还有内地来穗务工者；40岁以下年轻人占了大多数，约为55万人，约占总数的80%^③。

在“两新”组织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在“两新”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以密切联系广大职工群众，引导“两新”组织健康发展，就成为广州市党的建设，特别是社区党的建设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① 数据来自中国广州网发布的信息。

② 数据来自广州市委组织部《2005党内统计概要》。

③ 广州市民政局组织处：《在社会中介组织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内部报告），2004年11月20日。